

程兆熊著

中國農業論衡 下冊

——新農業哲學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程兆熊 著

中國農業論衡
——
新農業哲學
下冊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四月初版

中國農業論衡

全二冊

——新農業哲學

精裝本基本定價十三元正
平裝本基本定價十元正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程兆熊

發行人

朱建民

印刷所及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臺北市1036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郵政劃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電話：(〇二)三一六一八
傳真：(〇二)三七一〇二七四

校對人：趙麗君 林曉筠

中國農業論衡 下冊目錄

第六部 中國農政

一、中國太平要義——中國農業政治	四五三
序言	四五三
第一章 治道	四五三
第二章 治體	四五六
第三章 治學	四七一
第四章 治術	四八三
第五章 治才	五一九
第六章 治風	五五八
二、中國治平要略——中國歷代農政之實施	五八七
序言	六〇二
第一章 重要的認識與主要的精神	六〇二
第二章 以士待農與以農待農	六〇九

第三章	重農抑商政策與兩種自由	六一八
第四章	農政上的四個教訓	六二五
第五章	孝弟與力田	六三七
第六章	吏治的準繩與農業的推廣	六四八
第七章	農業的推廣與帝王的勸課	六六一
第八章	農政上的變與常	六七二
第九章	國防上的農政與民生上的農政	六八三
第十章	農政上的文化理想	七〇一
第十一章	井田與新井田	七一七
三、中國歷代農政實錄		七三六
(一)上古至周秦		七三六
(二)前漢		七五四
(三)三國		七八〇
(四)晉		七八七
(五)南北朝、隋		七九三
(六)唐		八一〇
(七)五代		八二六

(八) 宋	八三二
(九) 遼	八四三
(十) 金	八四四
(十一) 元	八六五
(十二) 明	八七六
(十三) 清	九〇〇

第六部

中國農政

一、中國太平要義——中國農業政治

序言

本書是從農業上談政治，而其根源，則是在從性情上談農業，因此拙著「中國農業與農民之文化的省察」一書，以及其他有關農業與庭園花木之作，原思總名為中國農書者，也是很可以合起來一看的。

從性情上談農業，已有不少人士認為不是當今之所宜。而從農業上談政治，更有許多人們譏之為實乃目前之迂語。其實性情之際，自古難言，何況今日？農業之道，不談則已，談則必迂。只不過難言，終不可不言，迂道更大有異於苟道。以言政治，尤須知其難言，而絕不可安於苟道。本此立論，縱使舉世非之，亦不暇顧。然人若能平心以觀，靜氣以求，究亦不難見出此心此理，實乃古今聖哲之所同然，本書又何敢逞其私見呢？

先哲張橫渠有「為天地立心」之言。及今思之，那只是求心靈的醒覺，而思從混沌中，把至大的心靈透出來。他又有「為生民立命」之語。及今思之，那只是求生命的安頓，而思從生物界，把至高的生命透出來。他接著又說道：「為往聖繼絕學」。及今思之，那也只是求性情的安排，而思從軀殼裏把至真的性情透出來。最後他更說道：「為萬世開太平」。及今思之，那更只是求人文的化成，而思從物化的趨勢下，

把至爲實在的歷史文化永續下去。

太平之道，是人文化成之道，而人文化成之道，亦復是至爲簡易之道。時至今日，那只要於昏昏沉沉裏見出心靈，就得了。那只要於蹦蹦跳跳裏，見出生命，就得了。那只要於花花綠綠裏見出性情，就得了。但當人們一思及昏昏沉沉裏，究毀滅了多少心靈時，當人們一思及蹦蹦跳跳裏，究損壞了多少生命時，當人們一思及花花綠綠裏，究埋沒了多少性情時，則時至今日，也就大可令人不寒而慄了。

雖然如此，那仍須得求救於一至大的心靈，至高的生命，至真的性情與夫至爲實在的歷史文化。若不唯此是務，那就無怪乎今日世界會一下子出現著各種形式的殖民主義。在魔宮劍影下，在絕對鬭爭中，會有人道之窮，會有性情之災，會有一大心靈的窒息，會有一代接著一代的生命的玩弄，則更成了人類歷史上亘古未有的奇禍。

史記太史公自序稱：「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

由春秋到戰國，更大有類於當今之世。六國亡了，秦亦隨即崩潰。在那裏，荀卿特稱「秦無儒」，整個心靈透不出。在那裏，法家之治是「以吏爲師」，整個生命透不出。在那裏，商鞅等，史記都稱其爲「天性刻薄人」，整個性情透不出。於是歷史文化在那裏經了一大曲折，而當整個心靈，生命與性情不能久窮久塞而思變思通時，則心靈一現，生命一顯，性情一露，秦之一代，便告終結。今千載之下，我們從張良的博浪椎擊處，還儘可看到當時的心靈。我們從項羽的破釜沉舟處，還儘可看到當時的生命。我們從劉

邦到做了皇帝而猶喜冠其微時的「劉氏冠」處，還儘可看到當時的性情。要知性情，生命與心靈之不可磨滅，就儘足證明著秦之一代，必歸於亡，而代之以興者，也必然會是大漢。

王莽之後，是光武中興，我們從劉秀的「自兄演之死，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也儘可看到當時的心靈，生命與性情之「否而復泰，塞而復通。」

由魏晉南北朝而隋末，能表現其一個偉大的生命的，是李世民。由殘唐五代至宋初，能顯露其一個深厚的性情的，是趙匡胤。由此，便來了一個生命的詩的時代，又來了一個性情的哲學的王朝。

朱元璋驅逐了元人而王天下，當其致函於其故人田興時，他寫道：「朱元璋自朱元璋，皇帝自皇帝，朱元璋不過偶然做了皇帝……」這知道自己只不過是偶然做了皇帝，這便儘會為那心靈，生命與性情，通透著一個大消息，讓大明的天下，放出歷史文化的異彩，而絕不偶然。

像以上這樣概括地把心靈、生命與性情，解釋著無數王朝的更替，自亦不難用來解釋著當今世局的推移。在人類的歷史中，心靈是本。在人類的世界中，生命是本。在人類的文化中，性情是本。而與此深相聯結，為時已數千年的便是農業，故農業是本業。據此本業以論政治，則從行所無事的無為中，見治道；從真常裏見治體；並以「心性即政治，義理即經濟」為治學；更從而求治術於「簡單化」之中，求治才於天性之中，以形成一種治風於新禮樂之中。這對當前的世局，總不致會是一種無本之談。

人必須是一種歷史文化的動物，那是由於人必須安頓於一種歷史文化之中，而與一大心靈，一大生命，一大性情，相呼吸，相聯結，並「相忘於江湖」。否則，便是天地喪心，生民喪命，往聖喪學，萬世喪亂。在喪亂中，人窮則呼天，呼父母，這是常情，也正是本性。心靈從天那裏來，天是一個不可知的宇宙

實體。生命從父母那裏來，父母更絕對是父母。而性情之際，則正是天人之際。這一呼天，呼父母，便顯露了人的情性。人是性情中人，事是性情中事，因之，人間終於會是性情中的人間，世界也終於會是性情中的世界，而歷史文化之大用，農業政治之大用，便是促進這人間和這世界的早早到臨。

本書分治道、治體、治學、治術、治才、治風六章，因所採取之體裁關係，可議之處，如理論之明確性不足，如構造之組織性不嚴，皆誠如不少友好之所評，使一已不能不加以虛心的接受。只是文字之體裁，終亦有關於人之性情，如讀者對本書所提出之許多觀點，亦多少感覺其生動，則此一體裁之在今日，未可全廢，亦正如不少友好之所論，而使一已似無舍此就彼之必要。如何之處，只有竭誠求正於高明。又本書印行不易，承詠滄昌祐及人生社諸友直接間接之協助，附此誌謝。又本書治道、治才、治風、治術等章，曾先後分別發表於新亞校刊、農聲、建設雜誌及中國內政月刊等，併此聲明。

第一章 治道

(一)真的氣象和真的政治

一、生命的安頓

我在中國農業與農民之文化的省察一書中，曾分析中國文化的農業之道有三特性：一為土的事業性，二為生的事業性，三為時的事業性。

這土的事業性，對中國以前政治上之反映是：「厚德載物」「民德歸厚」和「一心定而王天下」。

這生的事業性，對中國以前政治上之反映是：「保民而王」「如保赤子」和「子庶民」。

這時的事業性，對中國以前政治上之反映是：「時中」，「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和「時乘六龍以御天」。

我在同書中，又曾分析中國民族的農民精神，有三特點：一爲不厭辛苦，二爲深知憂患，三爲沒有死的觀念。

這不厭辛苦的精神，對中國以前政治上之反映是：「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這深知憂患的精神，對中國以前政治上之反映是：「吉凶與民同患」和「先天下之憂而憂」。

這沒有死的觀念之精神，對中國以前政治上之反映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和「如以人禱，吾請自當」。

上述六點意義，其實都是由一點意義作出發點，此即針對農業上之生物的培育，政治上便自覺地認識了生命的安頓，爲其應有的本質。

二、歸於性情

把生命的安頓，作其應有的本質，這是中國農業政治之一大特色，於此便澈底否定了政治只是統治的事，甚至只是階級統治的事，也從而否定了國家是所謂「必要的惡」，甚至是所謂「階級鬭爭的工具」。這便使政治成了溫暖，而不是冷酷；這便使政治成了陽明，而不是陰暗。由此而來的政治之定義，自然會是「政者正也」，和治國「猶如治身」。這引申而來的意義，會又是政治的實踐，即道德的實踐；抽象的國家，乃是有血有肉的軀體。這因之而至的事體，會更是政治的關係，即倫理的關係；而「一個國家的存

在」乃等於「一個性情的存在」，人是性情中人，政治是性情中事，國家的存在，自是性情的存在。於是政治從事生命的安頓，而國家則成了生命的歸宿。這裏有無邊的厚度，這裏有極大的安定，「其動也天，其靜也地」，這使治道成了地道，所謂「坤厚載物」；於此「安定」是第一個政治的要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是第一個政治的標的。接著而來，就有了無邊的生意和絕大的情味，這使治道成了聖道，所謂「內聖外王」，以赤子之心，保著蒼生，以赤子之心，保著赤子，「知道父的只有子」，為著子的也就只有父，一切是心誠求之，一切是誠心待之。於是接著而來的，更有無邊的涵蓋和絕大的超越。這更使治道成了天道，所謂「其仁如天」，「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那是「君子而時中」，那是「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那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就是一草一木，也會「各得其所」，一切有了安排，一切有了撫育，一切有了滋潤，一切有了涵容。只不過像這樣的政治的事業，從生命本身看來，其實也不過是「太空中一點浮雲」，「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和「賺得了一個世界，賠了一個生命」，都是不值得一試的。對生命說，「其本原自無而生有，其功行自有而歸無，有無之間，其機甚神，一念自信，獨往獨來……」（王龍溪語），從這裏，不由你不去超越，這超越是一個絕大的超越，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裏是「時乘六龍以御天」，這裏是「首出庶物，萬國咸寧」。這裏是真的「氣象」和真的政治。同時，也只有在這種氣象裏，在這種政治裏，纔能有「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和「先天下之憂而憂」以及「如以人禱，吾請自當」一類的政治家。同樣也只有這樣的政治家，纔能具備著那種氣象和成就那樣的政治。

(二) 農業政治天道聖道與地道

一、農業政治是什麼？

農業政治是環繞於一個農業國家，而真正代表著絕大多數的農民之政治。於此，中國的農業政治，乃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奇特的農業政治，因為截至目前為止，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還沒有出現過第二個像中國這樣大的農業國家，也沒有出現過第二個像中國這樣久的農業國家，更沒有出現過第二個像中國這樣高度集約的農業國家，同時一個國家的農民，為數如此之多，百分數如此之大，而且一開始便被納入於一個獨特的歷史文化的傳統裏，並獲其一種獨特的歷史文化之生命的安頓，從而讓一個國家民族的問題，成了歷史文化的問題，也從而讓其本身的農民問題，成了一個歷史文化的問題。所謂「入夷狄則夷狄之，入中國則中國之」，到後來，所謂「天理」，所謂「良心」等形上的名辭，竟成了一個極普通的中國農民之日常語言和日常論證，這在整個世界人類歷史上，也是沒有出現過第二次的。中國的農業政治，就是環繞於中國的這樣一個農業國家，而真正代表著中國的這樣絕大多數之農民的政治。

於此，黃帝的「垂衣裳而天下治」，這是把中國農業政治上的治道，當成了上述的天道。

於此，堯舜的「篤恭而天下平」和「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這是把中國農業政治上的治道，當成了上述的聖道。

於此，大禹的「竭力以勞萬民」和「卑宮室，而致力乎溝洫，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以及文王的「視民如傷」和周公的「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這是把中國農業政治上的治道，當成了上述的地

道。

史載：「商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謂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余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這一事據有些國史權威學者之說，會多少不免有點做作。但古人已矣，就事論事，此一做法，總也是「厚之至也」；此一做法，總也是把中國農業政治上的治道，當成了上述的地道。

二、道家的省察——道家的無爲

對中國農業政治上的治道，成了天道，首先作其玄學上的省察者是道家。他們根據史事的累積和人事的激盪，加以自然的昭示，便在全人類的政治史上第一次揭出了「無爲」之說，這「無爲」之說的道理，是貫徹於中國農業政治上的治道之內，而爲其骨髓的。這一「無爲」的治道所成就的政治，表面看來是一個消極政治，但其實是一個經驗政治。時間的積累，成了經驗的積累，於是經驗的政治，就更成了真實的政治；既成了真實的政治，那便又成了一個在任何積極有爲的時代裏都不可違反的政治。大唐是歷史上一個最爲積極有爲的朝代，而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對唐睿宗陰陽術數之問，就回答說：「道者損之又損，至於無爲，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當睿宗說著：「理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他更答道：「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把身看成是真實的，就應當把國看成是真實的，把國看成是真實的，就應當把政治看成是真實的，到政治被看成是真實的政治，而不能有一點做作，有一點僞的時候，這便是政治成了客觀化。到政治真成了客觀化的時候，這便是以國人治理著國人，以天下人治理著天下，而非以我治理著國人，治理著天下；也非以我的作爲或「人爲」治理著國人，治理著天下，一說到作爲，